

THE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THE

REPUBLIC

OF AMERICA

FROM 1776 TO 1876

BY

W. H. CHAPMAN

AND

W. H. CHAPMAN

AND

W. H. CHAPMAN

AND

W. H. CHAPMAN

AND

W. H. CHAPMAN

AND

W. H. CHAPMAN

AND

W. H. CHAPMAN

AND

W. H. CHAPMAN

AND

W. H. CHAPMAN

AND

W. H. CHAPMAN

AND

W. H. CHAPMAN

AND

W. H. CHAPMAN

AND

W. H. CHAPMAN

AND

W. H. CHAPMAN

AND

W. H. CHAPMAN

AND

W. H. CHAPMAN

AND

W. H. CHAPMAN

AND

W. H. CHAPMAN

AND

W. H. CHAPMAN

AND

W. H. CHAPMAN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九五”规划重大课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史研究”成果之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 重要教育文献

1976 ~ 1990

何东昌 主编

海南出版社

1976

760214

在批判旧世界中建设新世界

我们是在哪些重大问题上同 17 年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对着干的？

中共朝阳农学院委员会

(1976 年 2 月 14 日)

编者按：教育界刮右倾翻案风的人加给朝阳农学院的一条主要罪名，就是指责他们不该讲同文化大革命前 17 年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对着干。朝农这篇文章摆事实，讲道理，深刻地批判了这一奇谈怪论。

可以看出：凡是像朝农那样敢于批判修正主义，认真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单位，刮右倾翻案风的人就感到特别不舒服，攻击也特别厉害；而像朝农那样，凡是毛主席怎样指示就怎样办的单位，由于有了丰富的革命斗争实践经验，他们反击右倾翻案风也很坚决有力。

我们朝阳农学院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斗、批、改高潮中诞生的。在批林批孔运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开展对《水浒》的评论的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把我们的经验归结为一点，就是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毛主席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办，坚决同文化大革命前 17 年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对着干，努力把学校改造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

但是，教育界刮右倾翻案风的人，却说什么“同 17 年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对着干的提法是错误的”。这就尖锐地提出了一个问题：对文化大革命前 17 年的教育应当怎么估计？对文化大革命以来的教育革命应当如何评价？这是一个事关路线的大是大非问题，一定要辩论清楚。

一、旧农大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 新农大就必须加强工人阶级的领导

文化大革命前 17 年的旧学校，由于无产阶级没有自己的宏大知识分子队伍，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仅在数量上占着优势，而且学校成了他们独霸的一统天下。虽然当时党和工人阶级也派了一些人进学校，但是由于当时教育阵地的领导权问题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也没有搞清楚在上层建筑领域实行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这个重大的理论问题，致使有的人被排挤出去，有的被资产阶级化掉，成了资产阶级的代言人，在学校里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因此，毛主席在《五·七指示》中尖锐地指出：“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摧毁了×××反革命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

统治。1968 年，毛主席发出了“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指示，工人阶级和它的最可靠的同盟者贫下中农，配合解放军战士进驻学校，打破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确立了工人阶级在教育阵地的领导权，揭开了无产阶级教育史上的新篇章。也就是从这时候起，我们农学院才开始发生了一系列深刻的变化。

工宣队、军宣队冲破重重阻力，把师生们从城市引导到农村。伟大领袖毛主席十多年前发出的农业大学要统统搬到农村去的指示，在我们学校得到了落实。为创办社会主义新型农业大学，迈出了有决定意义的一步。师生们到贫下中农当中去办学，把农业大学直接置于贫下中农的管理之下。在教育制度、教学方针和教学方法上进行了彻底的改革，使社会主义新型农业大学初具规模。学校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顶住了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回潮和多次的攻击，坚持了毛主席的《七·三〇指示》、《五·七指示》和《七·二一指示》，巩固和发展了教育革命的成果。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工人阶级的坚强领导和工农群众的直接参加，是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的根本保证。教育界奇谈怪论制造者却说什么工人不懂教育，“要由热心科学的外行来领导”。这无非是要排斥工人阶级的领导，重新恢复修正主义路线对学校的统治。实践证明，工人阶级完全懂得怎样按照无产阶级的面貌改造旧教育。也只有工人阶级才能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在学校这块阵地上，对于工人阶级领导的任何攻击，都是把矛头指向无产阶级专政，都意味着对无产阶级的背叛和对资产阶级的投降。在这次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我们重温毛主席关于“实现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必须有工人阶级领导，必须有工人群众参加”的伟大指示，倍感亲切。我们要进一步加强党的领导，充分发挥工宣队的政治作用，带领全院师生共同努力，把文化大革命前 17 年那样的旧学校，按照无产阶级的面貌，彻底改造过来。

二、旧农大集中办在城市里， 新农大分散办在农村

多少年来，农业大学都办在城里，庄稼院和农学院之间好象隔着十万八千里。这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造成的恶果。

毛主席早在 1958 年就指出：“农业大学要统统搬

到农村去”。毛主席这一指示，为改造旧农大指明了方向。但是，在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统治下的沈阳农学院，不为农村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服务，拒不执行毛主席的指示，硬是留在城市里不走。贫下中农气愤地说：“像这样的大学，不如黄了好。”

1969年底，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锻炼的我校广大革命师生，认真学习了毛主席关于教育革命的指示，执行辽宁省委关于沈阳农学院分散办学的决定，在工宣队的带领下，来到朝阳山沟创办社会主义农业大学。一到农村，立即受到了广大贫下中农的热烈欢迎。他们高兴地说：“有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有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才能到这儿来。”

到农村后，师生们立即投入了农业学大寨运动，在生产队办夜大学，宣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组织科学实验队，宣传农业“八字宪法”，和贫下中农一起挑沙垫地，改良土壤，搞科学种田，使所在大队当年的粮食产量有了大幅度增长。师生们还帮助生产队管理果园，修剪果树，打药灭虫，苹果产量当年就翻了一番。大家深有体会地说：“农大办在城里就是见鬼，只有办在农村才能见太阳！”

教育界奇谈怪论的制造者说什么“五年普及大寨县，都像朝农的水平能行吗？”这不是说，按照毛主席指示，农业大学搬到农村就不能提高了吗？这是不是要我们再从农村搬回到城市呢？农业大学从城市搬到农村，绝不是简单的地点转移，而是一个为谁服务、走什么道路、执行什么路线的问题。农业大学离开农村，就谈不上为农业学大寨运动服务，也不可能培养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总结六年农村分散办学的实践，我们深深体会到，从城市搬到农村，是办好社会主义农业大学的起点。

三、旧农大大搞“学而优则仕”，新农大实行“社来社去”，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新农民

历来一切剥削阶级无不把“学而优则仕”奉为办学宗旨。旧农大打着培养所谓“红色农学家”、“高级建设人材”的幌子，实质上贩卖“学而优则仕”、“读书做官”一套货色，学校成了修正主义的染缸，培植资产阶级精神贵族的温床。我们新农大，要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就要一反几千年“学而优则仕”的孔孟之道，同旧的教育传统实行最彻底的决裂。

毛主席光辉的《七·二一指示》，是彻底摧毁封、资、修反动教育传统的强大思想武器。毛主席指出：“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我们实行社来社去、农大毕业当农民的办学方向，是毛主席这个光辉指示在我们农业院校的具体落实。社来社去，就是学员从农村人民公社中来，毕业后仍然回到社队去当农民。这个制度一实行，就受到贫下中农的热烈欢迎。

从1971年开始到现在，我们学院已有三届长期班340多名社来社去的大学毕业生回到农村，当上了一代新型农民。他们反了几千年来“读书做官”的旧传统，向资产阶级法权勇敢挑战，实现了巴黎公社“在事实上而不是在口头上同升官发财的思想作斗争”的原则。他们朝气蓬勃地战斗在农村三大革命运动的第一线，和

广大贫下中农一起，为农业学大寨做出了新贡献。贫下中农对社来社去的大学毕业生给了很高的评价，称赞他们是“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先锋”，“领导班子的好参谋”，“一批社会主义的新农民”。

社来社去，是学校由资产阶级专政的工具转变为无产阶级专政工具的重要标志之一。它一出现就遇到资产阶级和旧习惯势力的顽强抵抗。现在奇谈怪论制造者又跳出来拼命攻击，胡说什么强调社来社去“打起仗来怎么办？”诬蔑社来社去是“投机取巧”。他们这样攻击、诬蔑，就是因为社来社去、农大毕业当农民，拆了“读书做官”的梯子，戳到了资产阶级的痛处，因而他们叫喊说：“培养工人、农民，这样学校就取消了”。按照他们的逻辑，培养工人、农民，就用不着办大学，上了大学就不应该再当工人、农民。这不就是说应当永远保持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应当永远由少数特权者垄断文化科学吗？苏联变修的教训是我们永远应该记取的。在苏联，很多原来的工农子弟，大学毕业了，爬上领导岗位，却背叛了无产阶级，成了修正主义分子。从这个沉痛的历史教训中，我们就不难看出奇谈怪论者的险恶用心了。

四、旧农大大搞“智育第一”，新农大首先办成无产阶级政治大学

在旧农大强调所谓专业分工，说农学院不是党校，不是干校，而是培养农业技术人材的地方，是传授农业科学知识的场所。就这样，旧农大以“专业分工”为名，推行资产阶级“智育第一”，把学校变成了资产阶级专政的工具。

为了彻底改变这种严重状况，我们在实践中提出：社会主义农业大学，和其他大学一样，必须办成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这是因为：第一、学校都是属各阶级的，在社会主义历史时期，学校不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就必然要变成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任何学校，如果想办成什么“纯业务大学”，忘记党的基本路线，忘记无产阶级专政，那就势必走到资产阶级的邪路上去。第二、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始终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着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性。在教育阵地上资产阶级同我们争夺青年一代的斗争是很激烈的。我们的工农兵学员虽然来自三大革命运动第一线，有一定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但他们毕竟年轻，没有受过旧社会的苦，缺乏长期斗争锻炼，有的学员抵制资产阶级腐蚀的能力较弱。因此，必须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他们的头脑，让他们逐步树立起无产阶级世界观。第三、农村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和两条路线的斗争是尖锐的、复杂的。农业生产上不去，技术固然是一个因素，但最根本的是方向、路线、道路问题。我们培养的学员，必须首先懂得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头上生角”、“身上长刺”，成为敢于大批修正主义，大批资本主义，大干社会主义，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的战士。这样，所学的科学技术也才能更好地发挥作用。

几年来，我们遵照毛主席关于“学校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转变学生思想”的教导，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把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作为必修课；每年有一个月到三大革命运动第一线上阶级斗争主课，以农业学大寨和

参加生产劳动为基础课。我们还组织学员定期回本社队参加三大革命运动,按照两个“彻底决裂”的要求,把学员扎根农村干革命的思想教育,贯穿整个学习的始终。结业不毕业,学员离校后学校仍然采取多种办法从政治上关心他们的成长,业务上帮助他们提高。

但是,教育界奇谈怪论的制造者却竭力反对我们这样办学。说什么这样搞不全面,“工学院总得学工吧?农学院总得学农吧?讲一面总是不成”。奇谈怪论的制造者真不愧是折中主义的诡辩家,把一个严肃的明白的政治问题,竟弄得这样糊涂。我们这里明明讲的是政治与业务谁是第一位的问题,谁是统帅的问题。难道奇谈怪论的制造者是缺乏起码的常识吗?很清楚,他们贩卖的仍然是旧学校那套“智育第一”、“业务挂帅”的货色。

五、旧农大极力标榜“正规化”,新农大坚持半工半读、勤工俭学

文化大革命前的旧农大,教育同生产劳动相分离,脑力劳动同体力劳动相分离,理论和实践相分离,用九分无用一分歪曲的知识去充塞青年的头脑,这就是关门读书的所谓“正规化”。我们新农大贯彻执行党的教育方针,把教育同生产劳动结合起来,把脑力劳动同体力劳动结合起来,把理论同实践结合起来,实行“半工半读,勤工俭学”。

几年来,我们坚持把生产劳动纳入教育计划,学员半工半读,教师半工半教,不仅用脑来劳动,而且用手来劳动,努力促进脑力劳动同体力劳动的结合,逐步使劳动成为学校生活的基础。师生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没有房屋自己盖,没有土地自己开。从1972年到现在共建大寨式拱房120间,开荒造地1000亩(去秋造地500亩)。1972年生产粮食6万斤,1975年增加到30万斤,争取逐步做到粮、菜、油、肉“四自给”。半工半读,工读结合,使学生为国家创造了物质财富,又学到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本领。我们从斗争实践中体会到:工农兵学员只有坚持参加生产劳动,才能保持劳动人民的本色。

可是教育界的奇谈怪论,却把按照“半工半读,勤工俭学”方针办起来的朝阳农学院和“五·七”大学、“七二一”大学,都当成“不能提高”的学校,编“另册”,说什么“提高也不能丢,否则,四个现代化问题就解决不了。”他们就是这样打着“提高”的幌子,维护过去“正规化”一套旧制度,反对半工半读的办学方针。

从社会发展来看,教育同生产劳动、脑力劳动同体力劳动、理论同实践的分离,是一个历史的现象,阶级的现象。这种分离,必将随着阶级的消灭而消灭。关于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思想,马克思、列宁和毛主席都有精辟的论述。早在1847年,马克思、恩格斯就指出:“把教育同物质生产结合起来”。列宁在1919年也明确指出:“把教学工作 and 儿童的社会生产劳动紧密结合起来”。伟大领袖毛主席在为我们制定教育方针时提出:“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劳动人民要知识化,知识分子要劳动化。”在给江西共大的信中又明确指出要“半工半读,勤工俭学”。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主席的这些指示,文

化大革命前的旧学校并没有贯彻执行,反而极力鼓吹孔老二那套“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货色,反对学生参加生产劳动,让学生脱离工农,结果扩大了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强化了资产阶级法权。奇谈怪论的制造者攻击半工半读,勤工俭学,实质是要把教育拉回到文化大革命前17年的老路上去,这是我们绝对不能容许的。

六、旧农大搞“三中心”、“老三段”,新农大建立以科研、生产带动教学的“三结合”新体制

旧农大为了培植资产阶级精神贵族,大搞“三中心”(以教师、书本、课堂为中心)、“老三段”(基础理论,专业基础理论,专业课)。我们新农大要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新农民,就必须反其道而行之,坚持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

伟大导师列宁指出:“没有年轻一代的教育和生产劳动的结合,未来社会的理想是不能想象的:无论是脱离生产劳动的教学和教育,或是没有同时进行教学和教育的生产劳动,都不能达到现代技术水平和科学知识现状所要求的高度。”在这里,列宁明确地指出了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的重要性和它们之间的辩证关系。

几年来,我们以农、林、牧三系为试点,建立了以科研和生产带动教学的新体制,把教学、科研、生产结合在一个课题组内,使半工半读的制度得到落实。如农学系,学员一入学就分别编到高粱、栽培、植保、土肥等8个课题组里,根据生产需要确定研究课题,又根据生产、科研课题要求确定专业教学内容。课题组内开展“官教兵,兵教官,兵教兵”的活动。能者为师,互相学习。像高粱课题组的师生,一边学习高粱栽培与育种理论,一边进行高产试验和新品种的选育。几年来他们已选育了两个新的不育系和两个新的恢复系,每年都配制几百个杂交组合。这样,就把理论与实践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了。

在大搞农田基本建设高潮中,遇到一个新梯田如何熟化、当年创高产的问题。土肥课题组师生就利用校内一块十亩左右的生土地进行实验。师生自己动手,整平、深翻、灌水、压肥、改土,并进行各种肥料熟化土壤的试验,发现利用腐植酸铵改良生土效果明显。他们就是在这块地里结合学习土壤“诊断”知识与技能。结果,去年获得单产800斤的好收成。结合课题研究进行学习,学员学得积极主动,生动活泼,不仅学到了真知,提高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而且丰富和发展了科学。

教育界奇谈怪论的制造者指责我们:“学农学的不学土壤学,不学栽培学”。这真是闭着眼睛瞎说。上述事实驳倒了这种毫无根据的指责。不过我们决不再像旧农大那样,不结合中国的实际去讲什么“西伯利亚的土壤”,不联系生产实际在黑板上讲什么“稻、稗区别”,而是把教学、科研、生产紧密结合起来。

七、旧农大高楼深院、与世隔绝,新农大坚持同三大革命运动息息相通

旧农大办在高楼深院,脱离无产阶级政治,脱离工

农群众，脱离生产劳动，使学生越学越蠢。对于这种旧教育制度，毛主席曾经尖锐地指出：“从小学到大学，一共十六、七年，二十多年看不见稻、梁、菽、麦、黍、稷，看不见工人怎样做工，看不见农民怎样种田，看不见商品是怎样交换的，身体也搞坏了，真是害死人。”为了改变这种摧残人材、摧残青年的状况，我们实行了“几上几下”的教学制度。“上”就是学员在学校或科教基点集中活动；“下”就是学员回到所在社队参加三大革命运动实践。专业不同，年级不同，回队实践的时间和次数也不一样。

几年来的实践证明，“几上几下”是教学制度上的一个革命。第一、把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办学的思想贯穿于教育的全过程。学员“上”的期间，由学校进行管理教育；“下”的期间，由社队党组织和贫下中农进行管理教育。学生既是学员，又是社员，和贫下中农始终保持血肉联系。过去那种“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四年不愿回家乡”的情景，在我们这里看不到了。广大工农兵学员深有体会地说：“社来社去是方向，几上几下是桥梁。”第二、使学员学习目的明确，“上”是为了“下”。学员带着自己社队生产中的问题，到学校学习，学了马上回到生产实践中去应用。在实践中遇到新的问题，又带到学校来学习，然后再回到实践中去应用。这样，使学生在“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过程中，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第三、不断促进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的改革。学生回队，带回了贫下中农提出的一系列生产实践问题。这就促使教师和学员一起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总结广大贫下中农的实践经验，不断充实教学内容、改革教学方法，在这当中师生互教互学，共同提高。第四、使学员在学习期间就能为农业学大寨贡献力量，落实了伟大导师列宁关于“在学习期间就成为推翻剥削者这一斗争的参加者”的教导。

“几上几下”拆掉了农学院和庄稼院之间的高墙，打破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把学校和社队连在一起，使教育革命和三大革命运动结合起来了，广大学员在风雨中炼思想，斗争中才才干，实践中学真知，学习中做贡献。教育革命出现了生动活泼的局面。这是对那些诬蔑我们教育质量“今不如昔”等谬论的有力回击！让那些刮右倾翻案风的“哭丧妇”去胡说八道吧！我们将继续沿着毛主席“教育要革命”的方向，勇往直前。

八、旧农大是少数人享受教育特权的“小宝塔”；新农大越办越大、越办越向下，使广大群众都有机会受教育

毛主席早在1927年就指出：“中国历来只是地主有文化，农民没有文化。可是地主的文化是由农民造成的，因为造成地主文化的东西，不是别的，正是从农民身上掠取的血汗。中国有90%未受文化教育的人民，这个里面，最大多数是农民。”在旧中国，存在这种严重现象是不奇怪的。可是全国解放以后的旧学校，仍然排斥工农子女，搞“小宝塔”，这是地主、资产阶级向人民实行文化专制的继续。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我们积极改变这种现象，使广大群众有越来越

多的学习机会。我们开始在全地区6个县建立了6个科教基点。后来这些基点下放给所在县，与县办的五·七大学合并。这样，地、县两级都办起了农业大学。公社办起了五·七中学，有的还办了五·七大学，大队办科学实验队，全区开始形成了农业科教网。我们同县、社各级学校密切配合，积极办好科教网。从1973年开始，又陆续在各县建立了7个科教基点。这些基点的任务是：组织教师、学员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协助社队把基点办成大寨式的先进单位；组织在校学员的“几上几下”活动和毕业生的工作；办好短训班，培训技术骨干。我们的目的是把学校办到贫下中农的家门口，便利贫下中农，努力满足朝阳地区的需要。全区300万贫下中农都是我们的老师，又都是我们的服务对象。几年来，我们采取办科学实验队、农民业余大学、分段教学班、短期培训班、流动教学班等形式，培训了16,000多名农业学大寨的骨干，为普及大寨县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教育界奇谈怪论的制造者百般攻击学校越办越向下，是他们对资产阶级教育制度行将灭亡的哀鸣。然而，哀鸣和咒骂都是徒劳的。那种少数人垄断文化的资产阶级教育是一定要灭亡的，而无产阶级的教育事业必然会因为学校越办越大，越办越向下而蓬勃发展起来。

九、旧农大只让学生受奴化，新农大充分发挥工农兵学员“上、管、改”的作用

旧学校引诱学生埋头读书，不关心国家大事，实行关、卡、压，考试方法以学生为敌人，搞师道尊严，学生只能俯首帖耳，听从摆布。“工农的年轻一代在这样的学校里，与其说是受教育，倒不如说是受资产阶级的奴化。”

现在的工农兵学员，是教育革命的生力军。他们上大学、管大学，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

为了充分发挥工农兵学员“上、管、改”的作用，我们在全院建立了工农兵学员“上、管、改”各级组织。院一级建立“工农兵学员上管改委员会”，各系建立了“上管改领导小组”。各级“上、管、改”组织的负责人，有条件的都参加同级党组织的领导。这样，工农兵学员发挥上、管、改作用，在组织上得到了保证。

在院党委领导下，在工宣队大力支持和关怀下，广大工农兵学员在创办社会主义农业大学的斗争实践中，总是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地反击各种错误思潮，捍卫毛主席的教育革命路线。他们勇敢地同一切剥削阶级的传统观念决裂，决心做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一代新人。他们带着强烈的阶级感情，刻苦学习，勇攀高峰，同教师共同承担教学、科研、生产任务，从各个方面做学校的主人。

教育界奇谈怪论的制造者对工农兵学员“上、管、改”大加攻击，叫嚷对工农兵学员“不要捧得那么高”、“上、管、改强调过分了”。在他们看来，工农兵学员不应该有“上、管、改”的权力。学生到学校的任务就是老老实实地读书，不要去管教育战线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这实际是为恢复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制造舆论。工农兵学员“上、管、改”是由无产阶级学

校的阶级性质决定的。社会主义大学要由工农兵自己来上,也应当由工农兵自己来管。几年来的斗争实践证明,大批工农兵上了大学,使学校的阶级关系、阶级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有了工农兵学员这支教育革命的生力军,工人阶级在教育阵地的领导权才能得到巩固和加强。

十、旧农大教师脱离工农, 新农大坚持 教师同工农相结合, 努力建立一支 无产阶级的教师队伍

“教改的问题,主要是教员问题。”旧农大把工农排斥在大学讲台之外,对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原有教师队伍,又不去引导他们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彻底改造世界观,这样一支教师队伍只能为资产阶级培养精神贵族,不能为无产阶级培养革命接班人。我们新农大,要把学校改造成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必须努力建立起一支无产阶级的教师队伍。

几年来,我们采取了多种形式,组织学员到先进社队和部队,拜工农兵为师,还聘请了一批专职和兼职的工人、贫下中农做教师,并从毕业的工农兵学员中选留一批拿工分的新型农民教师。这些做法,使更多的贫下中农直接参加教育革命,逐步形成了无产阶级力量的优势。工人、贫下中农怀着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登台,讲课生动活泼,通俗易懂,深受学员欢迎。对原有教师,我们努力按照党的知识分子团结、教育、改造政策,引导和鼓励他们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组织他们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到农村先进社队插队落户,分期分批到科教基点蹲点,同学员一起到社队上阶级斗争主课,在校内实行半工半教、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等等。从而促进他们的世界观改造,调动了他们的社会主义积极性。

760623

国家计委、教育部 关于 1976 年高等院校毕业生分配问题的请示报告

(1976年6月23日 国务院批转)

国务院:

1976年全国普通高等院校将有14万余名工农兵学员毕业。这届学员,经过批林批孔、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评论《水浒》,特别是批判×××,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继续革命的觉悟进一步提高,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他们批判了……“读书做官”、“知识私有”等反动谬论,纷纷表示:“人民送我上大学,我上大学为人民”,毕业后要永与工农划等号,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到党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做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缩小三大差别的促进派,以实际行动反击右倾翻案风。这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是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丰硕成果。

对于这届毕业生分配中的有关问题,经同部分省市、高等院校和部、委研究,提出以下意见:

一、毕业生分配工作,必须在各地党委的一元化领导下,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认真学习

教育界奇谈怪论制造者扬言什么知识分子改造过了头,积极性调动不起来等等。这是对党的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政策的歪曲和攻击。我们这几年的实践证明,知识分子越是同17年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划清了界限,越是愿意同工农兵相结合,世界观改造得越彻底,他们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就越高。我们许多教师过去不关心农村生产,而在故纸堆里求名利;现在是急贫下中农之所急,在三大革命运动中贡献力量。老教授龚畿道在和贫下中农相结合的过程中,焕发了青春,积极和贫下中农一起培育高粱新品种。他为了及时地给制种田做好杂交套袋,扛着羊皮纸,趟过了齐腰深的大凌河,步行40里山路赶回基点。他说过去走错了路,现在要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晚年为人民多做些贡献。广大教师深有体会地说:这几年有所作为,就是因为坚持了同工农结合,逐步转移了立足点。谁想挑拨我们同党的关系、同工农的关系,拉我们倒退,那是痴心妄想!

× × ×

6年来,我们在教育革命中取得的成果,是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路线指引下,同17年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对着干,干出来的。“同17年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对着干”的口号,表达了革命师生同旧教育制度势不两立,彻底决裂的决心,同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妄图改变党的基本路线,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斗争到底的决心和创建新教育制度的气魄。

刮右倾翻案风的人是一切旧制度的辩护士,是资本主义的复辟狂。我们与他们是势不两立的。不管在我们前进的道路上,还会遇到什么艰难险阻,我们都要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

原载1976年2月14日《人民日报》

毛主席一系列重要指示,要认真落实毛主席的“七·二一”指示,从有利于加强无产阶级专政,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缩小三大差别出发,支持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胜利成果,使学生不但从工农中来,而且回到工农中去,做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

二、这届毕业生,是1973年遵照毛主席关于“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的指示精神,按计划招收的。招生时,已明确学员毕业后要实行《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规定的“一般返回原单位、原地区工作;特殊需要的由国家统一分配”的原则。毕业分配工作,要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指示精神,使广大毕业生回到基层、回到生产第一线,参加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的实践。今年,县以

上党政机关原则上不分配应届毕业生。科研、设计单位和高等院校要求分配应届毕业生,要从严掌握,如确需分配少数毕业生时,应按隶属关系经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或国务院有关部、委审批。

要积极学习朝阳农学院的新鲜经验,热情支持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对于招生时已规定“社来社去”的,应坚定地按原规定执行;对于招生时没有明确规定“社来社去”,而毕业生自愿要求到农村当农民的,要积极支持,热情鼓励,并由接收省、市、自治区对他们下乡后当年的生活问题,作出妥善安排。

要根据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需要,注意结合毕业生所学专业进行分配。少数回原单位、原地区不适合,而其它部门、地区又确有需要的,各省、市、自治区和有关部门,在制定分配计划时,可进行适当调整。

三、今年中央一些部门和个别省、区要求统一调剂毕业生3700余人(其中西藏提出需要1490余人)。考虑到各工业部门所提要求大部分应从本系统现有的工人、技术人员中解决,经商定,为了解决国民经济中若干重点建设工程、国防建设、支援西藏和少数部门的某

些特殊需要,今年计划全国统一调剂1339名毕业生(其中支援西藏500名)。对列入国家调剂计划的名额,由学校所在省、市、自治区负责落实,要尽量从本省、市、自治区的培养名额中安排;如安排确有困难,也可以从中央部门或其它省、市、自治区培养名额中抽调,被抽调的单位、地区应予以支持。

四、毕业生分配后的待遇问题,在国家没有新的规定以前,暂按各省、市、自治区的临时办法执行。

在分配工作中,要切实抓好政治思想工作,使毕业生树立革命的全局观点,服从国家需要,愉快地走上新的战斗岗位,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贡献力量。

以上报告,如无不妥,请批转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和国务院各部、委参照执行。(本文有删节)

国家计划委员会
教育部

1976年6月14日

附:1976年普通高等院校毕业生调剂计划(略)
根据国家教委档案处提供的文件刊印

760725

教育部关于转发辽宁省教育局 1975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总结的通知

(1976年7月25日)

辽宁省去年各类高等学校试行“社来社去”、“厂来厂去”、“哪来哪去”(简称“三来三去”)原则的经验很好,符合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教育要革命”的一贯思想,是进一步落实毛主席“七·二一”指示,改革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分配制度,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深入开展教育革命,把学校办成无产阶级专政工具,培养和工农“划等号”的普通劳动者的重要措施之一,大方向是完全正确的。要认真学习,广泛宣传,有步骤地加以推广。

现将辽宁省教育局《1975年招生工作总结》转发给你们,望结合本地的实际情况参照执行。

贯彻落实毛主席“七·二一”指示,改革旧的招生分配制度,是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必然会受到党内资产阶级,特别是走资派的反对和破坏,也会受到旧的传统习惯势力的阻挠,不可避免地贯穿着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种世界观的激烈斗争。根本在路线,关键在领导。新的招生制度,包括“三来三去”的经验,还要在教育革命的实践中逐步完善。因此,今年的招生工作必须在各地党委的领导下,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认真学习毛主席最近的重要指示,联系实际,深入批判……修正主义奇谈怪论的反动罪行。广泛深入宣传毛主席的教育革命思想,做好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要注意抓好典型,总结经验,认真研究解决有关的方针政策问题,紧紧依靠广大工农群众,坚定不移地落实毛主席的“七·二一”指示,为把学校办成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而斗争。

具体招生办法,仍按国务院国发〔1974〕61号文件规定的原则执行。

附件:

以阶级斗争为纲,遵照毛主席的“七·二一”指示彻底改革旧的招生和分配制度
——1975年招生工作总结

1975年,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推动下,为进一步落实毛主席的“七·二一”指示,我省各类高等院校的招生和分配工作推广了上海机床厂“七·二一”工人大学和朝阳农学院的经验,试行了“社来社去”、“厂来厂去”、“哪来哪去”(简称“三来三去”)的原则。

去年全省共招生12,305人,其中,除属于中央各部委分配的675人外;其他属于我省招生分配的11,630人中,社来社去的6601人,厂来厂去的4730人,国家统一分配的(主要是外语)299人。新学员中的党团员和社队干部多;铁心务农、决心扎根农村干革命的多;实践经验丰富的老工人、贫下中农多;实践经验与所学专业对口的多。

近一年的初步实践说明:遵照毛主席的“七·二一”指示,高等学校招生分配实行“三来三去”,是对旧招生分配制度的进一步改革,是发展教育革命的一项重要措施。它有利于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有利于促进工农业生产和文化科技的发展;有利于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缩小三大差别,使学校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

一、“社来社去”、“厂来厂去”、“哪来哪去”的招生分配原则是怎样提出来的

文化大革命以来,我省的招生和分配工作,在毛主席“七·二一”指示指引下,坚持了党的阶级路线,依靠工人贫下中农,从有实践经验的工农中选拔学生,根

本改变了17年把工农及其子女排斥在大学门外的现象；根本改变了“智育第一”、“分数挂帅”，中学毕业直接上大学的现象；根本改变了少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掌握招生大权的现象。但在分配去向上还存在一些问题。首先，很多学员毕业后还没能真正回到工农和生产实践中去，仍然由国家包下来当干部、技术员，这不利于缩小三大差别，不利于培养和工农划等号的普通劳动者。其次，从知识青年中招的学生，毕业后全部由国家分配，也不利于知识青年扎根农村干革命。

我们曾到工农群众中做过调查，工农业第一线的同志反映，这几年招生有“两好一不好”：从工农中招生好，由工农掌握招生大权好，送一个飞一个不好。送学生时普遍有“三怕”：一怕回不来，二怕用不上，三怕思想变。一些中小企业更是强烈要求彻底改革招生分配制度，保证“厂来”也能“厂去”。

从朝农的实践经验来看改革招生分配制度是完全必要的和可能的。朝农实行“社来社去”已六年，三届长班已有340多人毕业回乡当农民。他们以阶级斗争为纲，批判资本主义，坚持社会主义，想着共产主义，不为名不为利，大学毕业当农民，不要工资挣工分。他们是贫下中农的贴心人，是能文能武的庄稼汉、生产队的好参谋，是自觉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一代新型农民。朝农的实践为全省试行“三来三去”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1975年初，伟大领袖毛主席作了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指出：“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学习毛主席的重要指示，使我们认识到，社会主义的学校，应该成为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的工具，应该培养有高度路线斗争觉悟、自觉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能文能武、能和工农划等号的普通劳动者。为实现这个历史任务，进一步落实党的教育方针和“七·二一”指示，根据朝农的经验，经过调查研究，省委决定从1975年开始，在全省高等院校试行“三来三去”的招生分配制度。

二、我们是怎样试行“三来三去”工作的

毛主席教导我们：“任何新生事物的成长都是要经过艰难曲折的。”“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实行“三来三去”的招生分配制度，不仅是制度上的一种改革，实质上是一场社会革命。它涉及到各行各业，联系到千家万户，触及到每个人的灵魂。为搞好这项改革，我们抓了以下几件工作：

1. 狠抓招生制度改革中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

实行“三来三去”从开始到现在，始终存在着激烈的斗争。广大工农兵对实行“三来三去”，热烈欢迎，坚决拥护，称赞这样的大学是“爱工大学”，“爱农大学”，“扎根大学”；赞扬这项改革“改到我们心坎上了”！他们说：“送去的大学生能回得来，用得上，我们打心眼里高兴。”

和几千年“学而优则仕”的旧传统决裂的“三来三去”制度，必然遭到旧的传统观念，旧的习惯势力的顽强抵抗。一些未改造好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大学毕业当工人、当农民看不惯，想不通。一些部门对此提出

了许多疑虑和担心。一小撮阶级敌人也乘机跳了出来，大肆煽动、恶毒攻击。特别是党内资产阶级，他们看到“三来三去”拆除了“读书做官”的阶梯，限制了资产阶级法权，触动了他们的既得利益，就拼命反对。明目张胆地攻击毛主席指示的“七·二一”道路“只是一种形式”、过时了，叫嚷“要挑中学生好的，要直接上大学”，他们攻击“培养工人农民，这样学校就取消了。”刮起一股右倾翻案风。面对这种形势，在省委的领导下，各地普遍用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武装群众，搞清“三来三去”的重大意义。同时还大造革命舆论，宣传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好，宣传新制度的优越性，宣传朝农“社来社去”的经验，用革命舆论压倒各种奇谈怪论。

各地还普遍开展了革命大批判，坚持斗争，扫清“三来三去”的思想障碍。我们的做法概括起来就是四批四坚持：狠批“克己复礼”，坚持前进，反对倒退；狠批“学而优则仕”、“读书做官”，坚持做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狠批“下乡镀金”、“变相劳改”，坚持扎根农村干革命；狠批“知识私有”，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通过批判，提高了广大干部和群众的路线斗争觉悟，使“三来三去”的招生工作能够比较顺利地进行。各地都有一批几次招生招工都不肯走，决心扎根农村的优秀青年，这次抢着报名到“社来社去”的大学。

2. 放手发动群众，紧紧依靠工人贫下中农。

许多市县党委在招生工作中，提出了“招生百名，教育（全市县）百万”的口号，既教育青年走“三来三去”的道路，又发动广大群众来做好这项工作。由于工人贫下中农根据实际需要挑选最合适的人去学习，这就保证了政治质量；学员带着阶级的委托和三大革命中的实际问题，为革命而学习的目的明确；大多数学员具有所学专业的实践经验，实践基础好。过去，各地培养的接班人、“顶梁柱”和决心扎根的青年很少入学，去年这样的人招收的特别多，凤城县招收的114名学员中社队干部多达35%。

3. 加强党对招生工作的领导。

各级党委都把招生工作做为上层建筑领域革命的大事纳入议事日程，由一名主要负责同志主持招生工作。在开展这项工作中，各地都抓了典型。试行“三来三去”以后，阶级斗争有什么新情况，会遇到那些政策性问题，各地都缺乏经验。因此，各级党委都十分注意抓典型，及时总结经验，推动面上的工作。在各级党委的领导下，各地以阶级斗争为纲，胜利地完成了招生任务。

三、我们的几点体会

通过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去年招生的实践，通过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我们认识到，遵照毛主席“七·二一”指示，学生“三来三去”意义是非常大的：

1. 促进了教育革命。学生“三来三去”，拆除了“读书做官”的阶梯，摧毁了将学校与经济基础隔绝起来的高墙，把培养人与选送使用人的单位紧密联系起来，使学校与社会三大革命斗争息息相通。学员仍作为原工厂、公社的一名工人、社员，带着三大革命中急需解决的课题入学。这就促使学校根据广大农村、厂矿和整个社会的实际需要，彻底改革旧的教学方针、教学内

容和方法。

2. 限制了资产阶级法权。大学生“三来三去”，做一名与工农划等号的普通劳动者，这是对“知识私有”、“技术垄断”和等级观念的有力批判；是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缩小三大差别的实际步骤，也促进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等新生事物的成长。

3. 有利于培养一支同党内资产阶级进行斗争的新部队。毛主席最近深刻指出：“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毛主席的指示告诉我们，党内走资派就是党内的资产阶级，是社会主义革命的重点对象。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是产生党内走资派的思想根源，“三来三去”就是对它的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是产生党内走资派的重要经济基础，“三来三去”就是对它的限制；按照“三来三去”的办学方向，学校培养敢顶修正主义，能批资本主义，大于社会主义的普通劳动者。这是挖产生走资派的根基、造就与党内资产阶级进行斗争的新人的一项重要措施。

实践证明，“三来三去”这一新生事物一出现，便在广大革命群众的心中扎下了根。尽管还很不完善，但是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在工农兵的精心培育下，必定会茁壮成长。

四、遇到的实际问题和我们的意见

“三来三去”是新生事物，需要不断地完善；遇到的一些实际问题，必须经过调查研究认真加以解决。但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实际问题，我们要坚持“七·二一”指示和“三来三去”的方向；坚持用唯物辩证的方法对待这一事物，肯定它的大方向，认真解决遇到的问题；坚持虚心听取广大群众提出的改进意见。

我们遇到的实际问题，主要是：①实行“三来三去”以后，党政机关、教育、科研、卫生等部门，补充干部和专业人员如何解决？我们的意见是，这些部门需要补充人员，可从工农业生产第一线按毛主席选拔干部五项条件选拔，其所需人数应纳入劳动计划统筹安排；②工人学员在校期间，五年以下工龄的是否带工资问题。我们倾向带工资上学，但尚需全国统盘研究；③实行“三来三去”，要求学校根据三大革命实际需要，调整、改造专业，同时也要求学校进一步改革教学制度、教学方针和方法。学校的教育革命如何适应这一新情况，也需要进一步研究和实践。

由于我们实践的时间很短，对这些实际问题虽然提出了一些办法，但因涉及面比较广，有些问题尚未解决，还需要进一步研究。（本文略有删节）

辽宁省教育局

1976年6月7日

根据国家教委档案处提供的文件刊印

761130

一个反革命的政治骗局

——“四人帮”炮制《答卷》作者这个假典型的调查

《辽宁日报》记者 《人民日报》记者

（1976年11月30日）

1973年7月19日，“四人帮”在辽宁的那个死党精心炮制的所谓《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以下简称《答卷》）连同“编者按”，在《辽宁日报》头版头条发表了。接着，《人民日报》等许多报纸，都以显著位置转载。一时，《答卷》成了所谓反潮流的“代表作”，《答卷》作者也被吹捧为所谓反潮流的“英雄”。资产阶级野心家江青大肆宣扬：《答卷》作者“真了不起，是个英雄，他敢反潮流”。“四人帮”在辽宁的那个死党更是得意忘形，到处狂叫：《答卷》作者“是块有棱有角的石头，我要拿起这块石头打人了”。假的就是假的，伪装应当剥去。随着王、张、江、姚“四人帮”的彻底垮台，这份所谓《答卷》的真相，终于大白于天下了。它完全是“四人帮”蓄意炮制的一个反革命的政治骗局。

“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要拣“石头”打人，是蓄谋已久的。

1973年4月，国务院下达了大学招生文件，强调要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的指示，改革旧的招生制度。明确指出：要坚持选拔具有二年以上实践经验的优秀工农兵入学，坚持群众评议和群众推荐，在政治条件合格的基础上，重视文化程度，进行文化考查，了解推荐对象掌握基础知识的情况和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也要防止“分数挂帅”。这些规定，给文化大革命以来

的高等院校招生工作指明了方向，有利于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成果，对于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教育方针，把学生培养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具有重要的意义。这种新的招生办法，既同“以分取人”那种旧的招生制度有着本质的区别，又同否定学文化这种形而上学的教育思想划清了界限。文件发下不久，“四人帮”在辽宁的那个死党窜到北京，同“四人帮”在某大学的亲信进行了密谋。他们诬蔑文化考查是大学招生的“弊病”，是“智育第一”、“文化至上”，要“辽宁拿出点材料来”。“四人帮”在辽宁的那个死党回去以后，大耍反革命两面派的手法，胡说什么：“文化考查可以搞，但是，我保留批判权。”他们一方面同意搞文化考查，一方面却要“保留批判权”，这不是赤裸裸地暴露出他们存心要整人吗！

当时，兴城县是辽宁省大学招生文化考查的一个试点。本来，在兴城考区，考生可以翻书，考题不是偏题怪题，考试方法也不是突然袭击。可是，“四人帮”在辽宁的那个死党却暗说什么“闭卷”，“搞得很紧张”，“从考题本身来看有些问题，考试方法也有问题”。他还别有用心地说，这“不是辽宁的问题，是全国的问题”。大家知道，这次大学招生，是文化大革命以来如何搞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一次试验，路线是正确的，即使有些地方由于缺乏经验，在实践中出现一些这样那样的

问题,也是不难纠正的。“四人帮”在辽宁的那个死党,抓住文化考查大做文章,以百倍的疯狂咒骂:“在今天,我们刚刚着手改变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的现象,居然有人千方百计逼迫工农兵去适应旧的教育制度,这实在是大有资产阶级反攻倒算之嫌。”“四人帮”的狗头军师张春桥,更是居心险恶地叫嚣:“这样搞法,把无产阶级寄予希望的青年卡在门外,使修正主义有希望,无产阶级没有希望。”他们一个叫嚷“有人”,一个马上说是“修正主义”。此唱彼和,真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他们把攻击的罪恶矛头,直接指向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指向敬爱的周总理和国务院其他负责同志,指向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心怀卑鄙目的的人,什么卑鄙手段都使得出来。“四人帮”及其在辽宁的那个死党,为了炮制《答卷》作者这个假典型,颠倒黑白,混淆是非,弄虚作假,真是费尽心机。

1973年7月10日,在辽宁省大学招生文化考查座谈会上,锦州市招生办公室负责人,汇报兴城县考试情况,谈到一个生产队长答不上卷给领导写信一事。“四人帮”在辽宁的那个死党,听了以后如获至宝,下令当晚打电话,把考卷和信火急送来。信一到手,他立即决定要《辽宁日报》加“编者按”发表。当时,有不少群众反映,《答卷》作者在信中打击别人,吹嘘自己,暴露出他自己倒是个“大学迷”。“四人帮”在辽宁的那个死党拣“石头”打人心切,竟说什么:“不要孤立地看一句话两句话,要看主流嘛,要看这封信发表后起的作用。”7月18日,他在退给《辽宁日报》的送审小样上,竭力为所谓的《答案》乔装打扮,把最能反映《答卷》作者写信意图的最后一段话,即“我所理想和要求的,希望各级领导在这次入考学生之中,能对我这个小队长加以考虑为盼!”统统删掉了,并亲自改写了“编者按”,为《答卷》涂上一层“反潮流”的油彩,指定第二天(即7月19日)立即见报。

“四人帮”在辽宁的那个死党,在他精心改写的“编者按”中,胡说什么《答卷》作者在这次考试中“似乎交了‘白卷’”,然而却是“一份颇有见解,发人深省的答卷”。这是墨写的谎言。事实是,6月28日下午,这个自称为“自我表现胜似黄牛”的《答卷》作者参加语文考试,谈《学习〈为人民服务〉的体会》,竟是不知所云,只得38分;29日上午,他参加数学考试,只得61分;下午,又参加理化考试,只答了化学部分的6道小题,得6分。结论很明白:《答卷》作者参加了所有的考试,每门考卷都答了题,他交的根本不是什么“白卷”。

《答卷》作者写信的目的,完全是乞求上大学,向上爬。考试前,他借书复习功课;考试时,他按期赴考。第二天下午考试,他睡过了时间,竟从窗子跳进考场应试。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早在公社文化考查时,《答

卷》作者就给领导写过乞求上大学的信。这次在县里考试,他答理化题时,“眼瞪着,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所苦闷的地方就在这里,几个小时的书面考试,可能将把我的入学资格取消”,深感自己上大学的“自幼的理想”即将变成泡影。在这种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他故伎重演,把卷子翻过来,掏出一个绿色塑料皮的本子,从上面抄下早已准备好的写给“尊敬的领导”的一封信。《答卷》作者在信中表白:“自己的政治面貌和家庭社会等都清白如洗”。现在一查,根本不是那么回事。《答卷》作者的生父,解放前是兴城县一家粮业油坊的股东、经理,公私合营后每月还收房租,拿定息,政治历史也很不清白。“四人帮”在辽宁的那个死党,在所谓的《答卷》发表之前,装模作样地派人到兴城县,作关于《答卷》作者“情况的调查”,但是不顾事实,美化《答卷》作者,“家庭成员和主要社会关系均未发现政治历史问题”。考试结束后,《答卷》作者还跑到县公安局找熟人挖门子,又到他原来的老师、县教育局长那里,请求“在录取考生时考虑考虑他的要求”。《答卷》作者上大学临时时,还对他的生父说:“这回我可熬出来了!”大量事实证明,《答卷》作者根本不是什么反潮流的“英雄”,而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大学迷”。

“四人帮”及其在辽宁的那个死党,不择手段地弄虚作假,炮制《答卷》作者这个假典型,把他捧起来,吹起来,“诱以:官、禄、德”,完全从属于“四人帮”反革命政治的需要,是为他们篡党夺权服务的。揭露“四人帮”及其在辽宁的那个死党的大量反革命罪行,使我们进一步看到,“四人帮”需要有《答卷》作者这样的人,充当他们的前台打手,在他们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中,说他们想说的话,办他们要办的事。果然,《答卷》作者随着“四人帮”的指挥棒,疯狂地向无产阶级进攻,他打着所谓“反潮流”的旗号,到处大放厥词,煽风点火,制造混乱,妄图打倒一大批中央和地方的党政军负责同志。毛主席逝世以后,他公开跳出来,恶毒攻击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攻击英明领袖华主席和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终于堕落成了一个现行的反革命。

乌鸦的翅膀遮不住太阳的光辉。“四人帮”及其在辽宁的那个死党拣“石头”打人,结果搬起石头打了自己的脚。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驱散了我国上空的那股乌云,这个反革命的政治骗局的炮制者——“四人帮”及其在辽宁的那个死党被揪出来了,《答卷》作者也暴露了他真右派的原形,真是大快人心!我们要在以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乘胜前进,彻底清算“四人帮”及其在辽宁的那个死党篡党夺权的滔天罪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把毛主席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

原载1976年11月30日《人民日报》

1977

770116

一场围绕自然科学基础理论问题的政治斗争

教育部大批判组

(1977年1月16日)

自然科学基础理论问题，是关系到我国科学教育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长远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历来得到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敬爱的周总理的关心和重视。但是，近几年来，有一个奇怪的现象：毛主席、周总理多次强调要加强的基础理论工作却被“四人帮”及其控制的舆论工具一而再、再而三地诬之为“妖风”、“阴风”而大加“围剿”。谁要是提及一下“基础理论”，就仿佛偷吃了“禁果”，犯下“弥天大罪”，“四人帮”的“帽子”和“棍子”就向你劈头盖脑地砸来。

人们不禁要问：这究竟是为为什么？这是一般的学术之争吗？不是。这是孤立的现象吗？不是。随着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的被粉碎，这个问题的性质愈来愈清楚地展现在我们的面前了。这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激烈斗争的深刻反映。

自1972年以来，围绕基础理论工作问题，“四人帮”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向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发动了三次猖狂的进攻，以此作为他们陷害周总理，篡党夺权的一个借口；而我们敬爱的周总理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雄伟气魄，同“四人帮”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英勇地捍卫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为发展我国基础科学建立了不朽的业绩。

“自然科学是人们争取自由的一种武装。”伟大领袖毛主席十分重视自然科学及其基础理论，对天体演化、基本粒子、生命起源三大基本理论方面的发展尤为关注。1972年，毛主席对一位科学家关于加强基础理论研究和教学的意见，表示了称赞。周总理根据毛主席的革命科技路线，对抓好基础科学研究，加强基础理论课教学，搞好理科教育革命和培养基础科学人材等方面，做了重要指示和具体部署。周总理语重心长地说：“不要如浮云一样，过了就忘了。”还严肃地指出：“有什么障碍要扫除，有什么钉子要拔掉。”这对于克服一段时间由于林彪和“四人帮”干扰而造成的忽视基础理论的倾向，对于坚持在广泛深入实际的基础上把基础科学搞上去，对于巩固和完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科技、教育领域的新生事物，都是非常及时和必要的。

但是，王张江姚反党集团及其在教育界的那个黑干将对周总理指示百般封锁、阳奉阴违、疯狂对抗。周总理指示要研究并实施的一项关于基础科学工作的建议，他们一不议，二不办。其他负责同志去抓，他们干扰破坏。就这样，不仅使周总理的指示“如浮云一样”

过去了，而且他们还在背地里恶毒攻击说，周总理的指示是“妖风”。这真是东风吹驴耳，不进反狂鸣！这里，我们看看他们怎样挖空心思地借周培源同志当时写的一篇文章施展阴谋诡计。

1972年春，周培源同志应约给《人民日报》写了一篇题为《对综合大学理科教育革命的一些看法》（以下简称《看法》）的文章，谈了自己学习毛主席著作和周总理指示的一些体会，以期引起大家的讨论和重视。然而，“四人帮”却视为异端，一直拖到了十月份，姚文元与张春桥合谋，耍了一个两面派的花招，一方面以《人民日报》发表会干扰批林整风为由，批转到《光明日报》发表；一方面又暗中指使他们控制的上海《文汇报》组织批判。“四人帮”在上海的亲信奉其主子的旨意，一面派人到北京摸底，一面策动学校组织人马批判。果然，经过一个月的背地摸底和幕后策划，这份报纸以名为讨论实为批判的方式，或唱双簧，或谈体会，或借学生之口，连篇累牍地发文，对这篇文章大布围剿阵。

人们要问：一篇关于理科教育革命的讨论文章，为什么惹得“四人帮”大动肝火，如此兴师动众，围攻挾伐呢？

“项庄舞剑，意在沛公。”这里面包藏着一个极其险恶的反革命目的。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张春桥曾给他的亲信下过一道密令：“周培源有后台，不管他后台多大多硬，就是要批！”请同志们注意，要害就在“后台”二字上。明批《看法》，暗揪“后台”，一语道出了张春桥的反动本意。原来这个早堕入“当总理”太虚幻境的家伙，就是要把矛头指向敬爱的周总理，搬掉他们窃国篡党的巨大障碍。怎么个“批”法？阴险狡诈的张春桥，鹅毛扇一摇，狗头里挤出了个鬼点子。听听他对周总理的恶毒诽谤吧：“他可以拿洋人的话压我们，我也可以用马克思的话来压他们。”这里，前半句是无耻的捏造，后半句是疯狂的反扑。狗头军师一煽风，反动文痞姚文元马上就点火，说什么“那些口口声声说要重视基础理论的，其实最不懂马克思主义，自然科学的基础理论就是自然辩证法。”主子放个屁，奴才唱台戏。“四人帮”在上海的死党和亲信立即鼓噪而起，什么“基础理论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呀，什么“我们现在给一些叫嚷基础的人搞昏了”呀，等等。于是，一个打扮得冠冕堂皇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各门科学的基础理论”的骗人命题，便由他们控制的《文汇报》连夜拉学生炮制黑文，抛将出去了。为了集中攻“后台”，他们取消了原定公开批《看法》的打算，更显出其意向决

非在一篇文章上。

“四人帮”满以为唱唱高调就可以压倒无产阶级了，这不过是痴心妄想。他们摆出既懂哲学，又懂科学的架式吓人，其实是狗屁不通。正如毛主席后来批判他们的那样：“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只要我们用马克思主义稍加剖析，就可以看出所谓“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自然科学的基础理论”，是一个否认和取消自然科学基础理论的诡辩论命题。试问，科学技术本身有没有基础科学，有没有基础理论呢？马克思在讲到科学技术发展时就曾指出：力学是“大工业的真正科学的基础”，化学、地质学和生理学“更直接地（与工业相比）成为农业的专门基础的科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2册第116页）。马克思的话指明了工农业包括其生产和技术在内，都是有其基础科学的。毛主席也说过：医学是建筑在解剖学的基础上的。既然工、农、医各种技术科学有其基础理论，那么这些基础理论能否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取代呢？当然不能。毛主席曾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关于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概括和总结”（《整顿党的作风》），它只能包括而不能代替物理学中的原子论，电子论。

这里有两个关系：一是自然科学和哲学的关系。现代自然科学成果特别是其基础理论的三大发现（细胞学说、能量守恒与转化定律、生物进化论）为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提供了科学的基础，而辩证唯物主义又成为现代自然科学的哲学基础；二是自然科学中工、农、医各种技术的应用科学与数、理、化、生、地等基础科学的关系。应用科学为基础科学提供了一定的技术和实践的基础，而基础科学又成为应用科学的基础理论。毋庸置疑，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对自然科学当然也毫不例外。但决不能把自然科学本身的基础理论，与作为指导思想的基础理论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两个内涵不同的概念混淆和等同起来。文痞姚文元故意把这两个关系、两个概念混为一谈，别有用心地在“基础”二字上偷换概念，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代替基础科学，否认基础科学的存在。表面上看来，似乎他是在着意抬高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地位，实质上是贬低和否认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指导作用，把它降低到具体的基础科学的地位上。“四人帮”这种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来“修正”马克思主义的卑劣伎俩，真可谓诡辩到家。他们的罪恶企图在于一箭双雕：既搞乱哲学和科学、基础和应用的辩证关系，取消和破坏基础科学研究与理科教育革命，又伪造一个“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罪名，陷害敬爱的周总理，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实现其篡党夺权的反革命阴谋。何其毒也！1973年，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周总理陪同下接见一位科学家时，指定要周培源同志参加，再次表示了对基础科学的极大关心和革命知识分子的热情关怀，同时这也是对“四人帮”妄图陷害周总理的有力的回击。

二

一波未平，又起一浪。围绕着基础理论研究问题的斗争并未就此结束，而是更深入更激烈地展开了。

1974年，伟大领袖毛主席在接见一位科学家时，

对周总理转呈的关于培养基础科学人材的意见表示了赞成，并且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的高度，极其精辟而深刻地阐明了理论与实践、基础科学与应用科学的辩证关系，驱散了“四人帮”1972年散布的层层迷雾，指明了自然科学及其基础理论探索研究的道路。这时，周总理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对基础科学研究和大学理科招生问题，又一次作了重要的指示。

毛主席、周总理的指示，极大地鼓舞了科技界、教育界的广大工农兵群众、干部、师生和科技人员。大家开展基础科学工作的革命热忱又一次迸发出来。在毛主席光辉指示指引下，有关部门组成了我国基础科学发展规划小组。然而工作一开始就遇到了“四人帮”设置的层层障碍。规划小组到上海调查时，“四人帮”及其在上海的死党和亲信有意挑拨和煽动不满，说什么“单独调查基础科学离开实践”啦，什么“单独调查会使知识分子产生不必要的敏感”啦。这个小组认真学习，深入调查，终于克服重重困难和障碍，短时间内即草拟出全国基础科学发展十年规划纲要草案。但是，“四人帮”及其一手把持教育领导部门的那个黑干将采用不过问，不理睬，不听汇报的反革命手法，致使规划草案束之高阁。这是“四人帮”对抗毛主席、周总理的指示，破坏我国基础科学工作的又一严重罪行。

最令人气愤的是，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开始后，“四人帮”及其黑干将在科技界、教育界煽风点火，把1972年贯彻毛主席、周总理的指示，加强基础科学研究和基础理论课教学，诬之为“复辟回潮”，作为科技、教育战线批林批孔的一个重要内容大批特批，光“帽子”就有刮“理论风”、“基础风”，搞“三脱离”、“走老路”四五顶之多。

所谓“抓基础理论就是走‘三脱离’的老路”，这是“四人帮”及其死党为大反所谓“理论风”、“基础风”而提出的一个蛊惑人心的论调。为了掩饰他们反对毛主席、周总理的丑恶面目，他们在自己控制的刊物上重新拿出《看法》一文，不点名地进行批判，说什么“1972年下半年，有的人在报纸上发表文章，鼓吹理科就是要搞基本理论，实际上就是重走‘三脱离’的回头路”。这是对理论和实践关系的不能容忍的歪曲和割裂。马克思主义者历来坚持理论和实践统一的原则，既反对那种脱离实践的空洞理论，也反对那种离开理论指导的盲目实践。必须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阶级斗争为纲，在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中清理和检验原有的基础理论，发展和创造新的基础理论。毛主席指出的“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路线，为自然科学基础理论工作指明了方向。周总理也多次强调：“要在广泛深入实际的基础上，把科学研究往高里提。搞点基础研究，把实践提到应有的理论高度。用毛泽东的光辉思想，批判地继承和发展自然科学理论。”那种认为一提基础理论就一定是脱离实践的观点，正是资产阶级的理论观的偏见。“四人帮”大反“理论风”、“基础风”，并不是重视实践，而是既破坏理论，又反对实践。他们一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二破坏生产斗争，三取消科学实验，是从根本上反对三大革命实践的。他们有意在基础理论上编造谎言，进行诡辩，把理论和实践的关系搞乱，正是他们形而上学猖獗，片面性的又一个典型例证。

在揭露“四人帮”及其死党第二次攻击《看法》一文的阴谋活动时，我们不能不提到狗头军师张春桥的一次丑恶表演。这个家伙又一次重演了30年代他在“三月的租界”扼杀进步文艺作品的故伎，信口雌黄，讥讽地说，这篇文章“300年以后有用”。这不仅是对《看法》一文，而且也是对基础科学工作的恶意攻击。不错，《看法》一文在谈到理论联系实际，既要满足国家当前建设需要又要照顾长远需要时，引用过300年前从科学实验中发现的、仍在目前生产中广泛应用的微积分作例子，说明了基础理论的深远影响。这有什么不对呢？这里哪有一点提倡进行“300年以后有用”的科学研究的意思呢？毫无疑问，理论研究必须紧密结合和服务于生产实践。但对某些处在实验研究阶段，暂时还看不出实际应用，却具有长远意义的探索性科研项目，是否就可以轻视或取消呢？让我们读一读恩格斯的一段话吧：“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任何一门理论科学中的每一个新发现，即使它的实际应用甚至无法预见，都使马克思感到衷心喜悦，但是当有了立即会对工业、对一般历史发展产生革命影响的发现的时候，他的喜悦就完全不同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75页）周总理也指出：“基础理论研究，对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必须给以足够的重视。”（在二届人大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一个是“衷心喜悦”、“给以足够的重视”的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一个是极端轻视、大加嘲弄的“四人帮”贵族老爷式的态度，两相对照，是何等鲜明啊！

人们有理由责问：为什么1972年已经被“四人帮”讨伐过的所谓“理论风”、“基础风”，现在又端出来作为“复辟回潮”大做文章呢？

“四人帮”的每一个活动步骤无不与其整个篡权复辟的阴谋紧密相联。他们妄图杜撰一个“基础风”、“理论风”，捏造一个“复辟回潮”的罪名，强加在我们爱戴的周总理身上，作为他们揪所谓“现代的大儒”，组织“江记”内阁的一个组成部分。“四人帮”之心，真是比豺狼还狠，比蛇蝎还毒！伟大领袖毛主席洞察一切，1974年11月，迎头痛击了王洪文等“四人帮”，痛斥了他们对周总理的诬陷，又一次挫败了“四人帮”的阴谋诡计。

三

1974年12月26日，伟大领袖毛主席发出了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反修防修的重要指示。1975年初，周总理在四届人大报告中，从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根本任务出发，遵照毛主席的指示，提出了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的宏伟目标。在这一形势下，科技教育战线如何深入开展社会主义革命，为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物质基础服务，是一个严重的任务，有许多工作要做。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在无产阶级政治的统帅下，抓好基础科学研究工作。当时，华国锋同志和其他中央负责同志曾先后对科技、教育部门作了重要指示，在抓好群众性科研活动的同时，要充分发挥专业科研机构的作用，对基础科学要给予足够的重视。1975年

8月，中央负责同志明确指示：教育部要抓基础科学。1975年9月，华国锋同志指示科学院要重视理论研究，并指出，批所谓“理论风”是完全错误的。

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周总理在四届人大提出的战斗任务，华国锋同志和其他中央负责同志的具体指示，给科技、教育界广大干部和群众以很大的鼓舞。教育部有关部门决定把当时工作的重点放在理科教育革命和基础科学研究方面，并且成立了专门小组。为了落实毛主席、党中央历来关于加强基础科学研究工作的指示，分别编辑了毛主席关于自然科学的部分论述，周总理关于基础科学和理科教育革命的部分指示，供部内工作人员学习研究，指导工作。

正当这项工作积极而稳妥地开展起来的时候，王张江姚反党集团及其在教育界的黑干将，又以十倍的疯狂，百倍增长的仇恨，向无产阶级反扑过来。

“四人帮”首先利用篡夺的舆论工具，又一次借基础科学工作问题向伟大领袖毛主席、敬爱的周总理和华国锋同志射来一支支反革命毒箭。他们炮制和发表大量文章，肆意割裂马克思主义只能包括而不能代替自然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公然大批特批“马克思主义不能代替自然科学”，直接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他们大肆攻击“科研要走在前面”是什么“奇谈怪论”，矛头又指向谁呢？我们知道，周总理早就指出：“自然科学研究人员应当联系实际，使研究工作走在生产建设的前面。”（在三届人大上的《政府工作报告》）这完全符合毛主席关于“理论应该跑到实践的前面去”（《整顿党的作风》）的教导。“四人帮”与此相对抗，根本否认基础科学研究对于生产和技术的能动作用，只能导致技术上照猫画虎，跟在别人的屁股后一步一步爬行。他们乱扣在别人头上的“洋奴哲学、爬行主义”的大帽子，戴在他们自己头上是再合适不过的了。

岂但如此，他们还借批《汇报提纲》，私整和散发攻击中央负责同志的黑材料，煽阴风，点鬼火，矛头直指华国锋同志和其他中央负责同志，妄图打倒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们极力对抗和诽谤华国锋同志对批所谓“理论风”错误的正确批评，说成是什么为基础理论“翻案”。更令人不能容忍的是，竟然篡改华国锋同志“强调依靠工农是对的”这句话，打进一个“相”字，变成“强调依靠工农兵是相对的”。然后张冠李戴地进行批判，由他们控制的一个刊物公开抛了出来。仅此一例，就可看出“四人帮”这伙反革命黑帮卑劣无耻到何等地步。

为了使大家开开眼界，这里还须公布一场发生在教育界的反革命丑剧。1975年，周总理关于基础科学和理科教育革命的部分指示刚刚编出，“四人帮”那个奔走于辽宁与北京之间的黑爪牙就采用特务手段私自窃走一份，然后送给“四人帮”的一个黑干将，并向野心家张春桥写诬告信，污蔑编印和学习周总理的指示是什么“党性不纯的表现”等等。1976年，他们的反动气焰更加嚣张，别有用心地把这说成是“总理语录”事件，然后在大会小会、会上会下严加追查，制造白色恐怖。他们公开叫嚷：“为什么把‘总理语录’印出来，为什么把总理的指示提到那么突出的地位？”还声色俱厉地宣称：“这是一个反革命阴谋事件！”请看，“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仇恨敬爱的周总理，仇恨爱戴周总

理的人民群众，已经达到何等猖獗的程度！

然而，就在“四人帮”得意忘形，准备穿龙袍，登皇位的时候，轰然一声震天响，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继承毛主席的遗志，一举粉碎了他们的反革命篡权迷梦。毛主席生前要打烂的但还没来得及解决的反党“四人帮”，现在打烂了。“四人帮”借基础理论问题所做的种种反党表演，已经成为他们不容抵赖的历史罪证。

在纪念敬爱的周总理逝世一周年之际，纵观几年来在基础科学研究问题上的政治斗争，重温周总理遵照毛主席一贯教导所做的加强基础科学工作的重要指示，历数“四人帮”破坏基础科学研究，阴谋篡权复辟的累累罪行，使我们深切地认识到：周总理不愧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正是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气概，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高度，把科学作为一种革命的力量，来抓基础理论工作的。“四人帮”的诅咒和毁谤，丝毫无损于周总理的光辉形象和崇高威望，丝毫磨灭不了周总理指示的重大意义和深远影响。同时，使我们清楚地看到：“四人帮”是

货真价实的党内资产阶级的典型代表，是不肯改悔的正在走的走资派。他们代表腐朽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推行一条极右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具有极大的欺骗性、危险性和破坏性。他们破坏的决不只是基础的科学研究，而是要败坏整个社会主义大业。对于他们的累累罪行，我们必须继续深揭狠批，彻底清算。

我们坚信：在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清算了“四人帮”的干扰破坏，毛主席、周总理关于自然科学基础理论工作的一系列指示一定能够迅速落实。只要我们继续坚持教育、科研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正确方向，树雄心，立壮志，努力攀登科学高峰，一定能够夺回被“四人帮”的干扰、破坏所耽误的时间，整个教育革命、科技战线的革命必将更加突飞猛进，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的宏伟蓝图一定能够实现。

我们有着无量的前程！

原载1977年1月16日《光明日报》

770222

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不容践踏

教育部大批判组

(1977年2月22日)

毛主席在《论十大关系》这篇光辉著作中提出：“我们一定要努力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的积极的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贯彻执行这个基本方针，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要认真落实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充分调动广大知识分子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但是，王张江姚“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肆意篡改毛主席对知识分子的正确估计，全盘否定广大革命知识分子的作用，恣意践踏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造成很大危害。他们的种种谬论，必须深入批判，他们的累累罪行，必须彻底清算。

党对知识分子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是以毛主席关于知识分子的科学分析为依据的。“四人帮”为了破坏党的知识分子政策，首先篡改毛主席对知识分子的马克思主义的估计。

1957年，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就对我国知识分子的现状作出了科学的分析，指出：知识分子中比较熟悉马克思主义，并且站稳无产阶级立场的，是少数；大多数是拥护社会主义，愿意为人民服务的，但是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对我们的国家抱着敌对情绪的知识分子是极少数。这就是通常所说的“两头小，中间大”，“这种状况在一个很长的时间内还会存在”。毛主席所作的这一分析和结论，反映了我国广大知识分子的实际，是我们党制定知识分子政策的理论基础，只有坚持毛主席对知识分子的这个正确估计，才能用毛泽东思想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使他们更好地为无产阶级服务。

但是，“四人帮”把毛主席的指示抛到一边，“帽子

工厂”越开越大。只要一提到知识分子，他们从来不做具体分析，就任意给戴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这是他们“形而上学猖獗，片面性”的一个突出表现。“四人帮”围剿湘剧《园丁之歌》，把剧中坚持毛主席教育革命路线的共产党员、青年教师俞英，打入“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行列，并且给她加上了“坚持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罪名，就是一个突出的事例。“四人帮”在辽宁的那个死党也胡说什么：解放后17年的学校“在那里一年一年地、一批又一批地造就这些人，毕业后还得重新接受改造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四人帮”还唆使反革命分子×××到处狂叫：如果社会帝国主义打到中国来，大多数教师“还可能打着白旗上街去欢迎”，“假如蒋介石要反攻大陆的话，恐怕比现在还高兴。”等等。“四人帮”对知识分子的这些攻击和污蔑，反映出他们对广大知识分子有另一种估计，即反对毛主席科学论断，蓄意颠倒社会主义历史阶段敌我关系的反革命估计。他们把旧教育制度和旧学校培养的学生混为一谈，这就从根本上篡改了毛主席教育革命的理论，转移了教育革命的方向。特别是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广大知识分子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虚心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努力改造世界观，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取得了可喜的进步，涌现出一大批决心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的积极分子。而“四人帮”对此却一笔抹杀，一概否定，这不是否定文化大革命又是什么呢？

二

毛主席历来十分重视知识分子在革命过程中的作用。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主席就指出：“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进入社会

主义革命时期以后，毛主席又一再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主要的社会成员是三部分人，就是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没有知识分子，我们的事情就不能做好”。1957年，在反对资产阶级右派斗争取得伟大胜利的时候，毛主席总结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进一步提出：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工人阶级必须有自己的技术干部的队伍，必须有自己的教授、教员、科学家、新闻记者、文学家、艺术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队伍。这是一个宏大的队伍，人少了是不成的。在这个宏大的知识分子新部队中，就包括从旧社会过来的真正经过改造、站稳了工人阶级立场的一切知识分子。毛主席的光辉指示，正确指出了广大知识分子在革命过程中的作用，鼓舞和鞭策着他们为适应这个时代的伟大斗争不断地努力改造自己。

一贯疯狂反对毛泽东思想的“四人帮”，竭力否定知识分子的革命作用。1974年，他们在国务院科教组的那个黑干将，大肆鼓吹的所谓17年培养出来的学生“基本上是对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起了破坏作用”的谬论，就是他们颇有代表性的论点。众所周知，知识分子本身并不是一个独立的阶级，他们可以为资产阶级服务，也可以为无产阶级服务，关键是使他们附在哪张“皮”上。文化大革命以前，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多数或大多数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与工农兵相结合，努力改造世界观，为人民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他们在向工农兵学习，为工农兵服务，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过程中，不断地得到改造。正如毛主席所说的：“从旧学校培养的学生，多数或大多数是能够同工农兵结合的，有些人并有所发明、创造，不过要在正确路线领导之下，由工农兵给他们以再教育，彻底改变旧思想。这样的知识分子，工农兵是欢迎的。”由此可见，“四人帮”鼓吹的所谓“破坏论”，道理上是反动的，事实上也是荒谬的。其实，对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乃至整个上层建筑起破坏作用的，不是别人，正是他们这一帮害人虫。同广大工人农民处于尖锐对立的阶级斗争状态之中的不正是他们吗？极其贪婪地侵吞国家财富的不也是他们吗？千方百计地想破坏革命，破坏生产，搞乱我们整个国家的不还是他们吗？

毛主席教导我们：“进行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要依靠学校中广大革命的学生，革命的教员，革命的工人，要依靠他们中间的积极分子，即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这就明确告诉我们，无产阶级教育革命是要改革旧的教育制度，而不是要打倒广大教师。相反，更要依靠其中的积极分子，团结广大教师。当然，广大教师也要在教育革命这个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中，努力改造主观世界。教改的问题，主要是教员问题。打击了广大教师，也就破坏了教育革命。“四人帮”动不动就斥责教师是“右倾复辟势力”，甚至居然提出取消教师的荒谬主张。“四人帮”的一个女黑干将在北京市一所中学搞“试验”，竟然说什么：“教师都是资产阶级世界观，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怎能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妄图创造一个取消教师而由学生自治的“典型”，拿出来放“卫星”！“四人帮”及其黑干将蓄意全盘否定教师在教育革命中的作用，充分暴露了他们与广大革命教师为敌的丑恶嘴脸。可以想象，如果“四人帮”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

导权的反革命阴谋一旦得逞，那么包括广大革命知识分子在内的全国人民，就会遭到他们法西斯专政的疯狂镇压。

三

“四人帮”肆意践踏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既破坏对知识分子的团结，又破坏对知识分子的教育和改造。

为了充分发挥广大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作用，我们必须全面落实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正确认识和处理好“团结”和“教育”、“改造”之间的辩证关系。团结是我们的出发点，从团结的愿望出发，耐心细致地教育他们，改造他们，帮助他们把立足点真正移到无产阶级一边来。这样，同工农兵的感情深了，共同语言多了，也就增强了团结。凡是真正愿意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知识分子，我们都应当给予信任，同他们搞好关系，帮助他们解决各种必须解决的问题，使他们得以积极地发挥他们的才能，在努力改造旧思想的同时，专心致志地工作。这样做，对于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是有利的。

“四人帮”一伙对广大知识分子百般仇视，一会儿辱骂他们是“围着臭鱼烂虾转”的“苍蝇”，一会儿又诬蔑他们是“书蛀虫”，根本谈不上半点团结。而对少数心甘情愿为他们篡党夺权效劳的人，却大施恩惠，大加吹捧，委以重任，抱成一团。臭名昭著的“梁效”就不是一个活生生的证明吗？

“四人帮”确实把“改造”喊得震天响，似乎只有他们才重视对知识分子的教育和改造。实际上，在他们那里，对广大革命知识分子来说，所谓“教育”、“改造”，不过是“打棍子”、“戴帽子”的代名词罢了。“四人帮”及其黑干将公然胡说什么：“改造教师就像水中按皮球，压一压下去了，一松手又会浮上来”，必须“永远把他们压在深水之中”。他们任意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利用发生在一个小孩子身上的人民内部的一般是非问题，大作文章，无限上纲，把“师道尊严”说成是教育战线的主要危险，煽动学生把教师当作“孔老二的徒子徒孙”来批判，甚至把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有错误的教师和干部，打成“败类”，扬言要实行“专政”、“判重刑”。这哪里是在抓“改造”？分明是镇压，搞法西斯专政！

“四人帮”肆意践踏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用“大棍子”打人，用“大帽子”压人，用“小鞋子”整人，致使广大革命知识分子欲干不能，欲罢不忍，左右为难，无所适从，哪里又谈得上全心全意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呢？为了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四人帮”不仅要搞垮工业，搞垮农业，搞垮整个国民经济，还要搞垮整个社会主义教育事业，以达到他们混水摸鱼，乘乱夺权的罪恶目的。

以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粉碎了“四人帮”，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也挽救了广大知识分子。我们深信，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联系教育战线的实际，深入揭批“四人帮”，广大知识分子一定能够更好地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努力改造自己，在为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服务中，做出更大的贡献！

原载 1977年2月22日《人民日报》